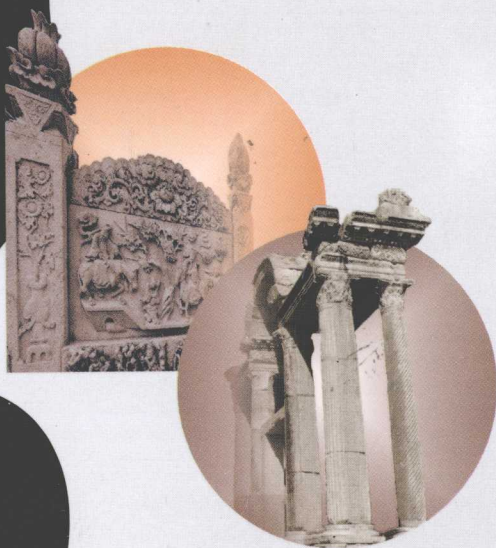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ZHONGWAI WENLUNSHI



中外文论史

第一卷

曹顺庆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013047858

I109
96
V1

比较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项目

中外文论史

第一卷

曹顺庆 主编



I109
96
V1



北航

C1655337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曹顺庆

编 委：冯宪光 王晓路 李 怡

徐新建 刘亚丁 阎 嘉

吴兴明 段志洪

秘 书：王彤伟

前言

从总体文学的角度研究中外文论

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尚没有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圈，从总体文学的角度，融全世界文学理论为一体的文学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专著。现有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专著，虽汗牛充栋，但或仅限于一国文学批评之论述^①，或囿于同一文化圈的文学理论述评^②。这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东西方文论天各一方的状况，显然不免各执一隅之解，而难拟万端之变：既不利于全世界文学思想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亦不利于深入认识各国、各文化圈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

① 如目前已出版的约十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印度出版的多部梵语诗学史，日本出版的多部日本文学评论史。

② 如目前已出版的许多西方文论史，代表性的如魏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人所著《文学批评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韦勒克（René Wellek）所著《现代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等以及中日、中朝文论关系史，代表性的如太田青丘著《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许世旭著《中韩诗话渊源考》等论著。

及其理论价值，更不利于建设总体文学理论或曰一般的文学理论（General Literary Theory）。尽管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曾一再呼吁应当撰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线的文学史”^①，主张“从国际的角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史”^②，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超越民族界线，堪称全球文学史的专著却千呼万唤难出来。至于跨越东西方文化圈的总体文学理论史或总体文学批评史，更是茫然无绪，迄今仍付阙如。这种状况，与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完全不相适应。

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何在？窃以为首要的因素之一，仍在于所谓“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这种偏见，不但在许多西方学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在不少东方学者的头脑中也势力强大！无征不信，兹略举数例以证之：

例证之一是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崇洋媚西现象。现在许多人喜欢讲全球化时代，但是，他们心中的所谓“全球化”，往往是“西化”。实际上，这种“言必称希腊”的现象由来已久，“唯西方马首是瞻”已非一朝一夕，积重难返，遂由此而形成了现当代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状态。季羨林先生很有感触地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译本），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版，第45页。

②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见于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① 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文论的不景气，亦颇有同感。原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十分感慨地说：“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 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② 孙津说得更加直率：“中国没有理论，这是我说的，至少现在是这样。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③ 当今中国文论界，可能情感上还不太能接受上述这些看法：难道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文论研究，竟然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然而事实是不考虑情感的。确实，我们出版了许许多多的《文学概论》，我们也写出了几可汗牛充栋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曾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我们甚至一直在努力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然而不知为什么，经过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经过无数学者的辛勤劳作，时至今日，我们终于发现这严酷的事实——“中国没有理论”（孙津语），“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季羨林

① 季羨林《东方文论选·序》，参见季羨林名誉主编，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 年第 1 期。

③ 孙津《世纪末的隆重话题》，《文艺争鸣》1995 年第 6 期。

语)，“别人有的我们都开始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毛时安语)，当今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黄维梁语)。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过分的西化，在长期的西化中失落了自我，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失掉了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失掉了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展开世界性的对话！显然也不大可能从总体文学的角度来撰写融全世界文论为一体的中外文论史。

例证之二是比较文学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内在矛盾。众所周知，比较文学研究的初衷，旨在打破各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将文学视为人类的共同财产，推动世界文学的交流与融合。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构想的歌德，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的不祧之祖。歌德的胸怀是相当宽广的，他深信“诗是人类共同财产”，主张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平心而论，早期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们，大都是具有宽阔胸怀，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然而，当比较文学进一步发展，“法国学派”诞生之时，学者们便开始背离歌德的“世界文学”宗旨，民族

① 《歌德谈录》(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性逐渐占了上风，正如美国学者韦勒克所指出的，“过去五十年中实际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心理和社会动机存在着一种矛盾状态。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 19 世纪学术演讲中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这种想作为各民族之间的协调因素的真诚愿望，却常常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①。从学科史上看，法国学者丢掉比较，实际上是逐步缩小包围圈，将比较文学加上了若干人为的限制，走上了为法国文学评功摆好的民族沙文主义之路。法国学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Fernand Baldensperger）在他的《比较文学的名与实》^②一文中，认为布吕纳介等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者所主张的那种“机械地”寻找不同文学类型之间因果关系的作法是站不住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而将比较文学局限于各国文学关系网的清理。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比较文学论》则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法国学派的观点。他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区别开来，将比较文学仅仅限制在一国对一国“二元的”事实关系的研究，并完全以欧洲为中心来讨论比较文学的性质和任务，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就是研究欧洲诸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这已将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缩小为欧洲文学，以后法国学派的学者们，则进一步将比较文学沦为“法国中心”的文化扩张主义。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比较文学的兴起是对 19 世纪学术界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反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引自《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 55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刊于法国《比较文学杂志》第一期。

动，然而法国学派却将比较文学引向了其反面，“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的影响……这种文化扩张主义，甚至在美国也可以见到”^①。这种文化扩张主义，小而言之，是法国中心论，大而言之，是西方中心论。“素有公允之称”的美国比较文学家威斯坦因，就反对将比较文学扩大到不同文明之间。他还“胸有成竹”、振振有词地说：“直到最近远东国家尚未根据类属对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的分类。”^②这完全是对东方文明的无知！其实，稍具中国文学常识的人就知道，曹丕（187—226）《典论·论文》已将文体明确分为四科八类，西晋挚虞就写出了文类专著《文章流别论》，到明代，则产生了研究文类的集大成之作——吴纳的《文章辨体》与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怎么能说迄今尚未对文学进行系统的分类呢？产生这种错误见解最主要的根源就是“西方中心论”，有了这种偏见，就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对东方文学及其文论采取怀疑、轻视甚至无视的态度；也正是这种“西方中心”的偏见，造成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东方国家不少重要文学作品和极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在西方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尤以中国文学理论为甚。诸如《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尽管引起了国外部分汉学家的注意，但在整个世界文学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② 威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按：最近威斯坦因的观点已有所改变，认识到了东方文学的地位与价值。

理论界，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认识和承认。对于《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深谙西方文论的台湾淡江大学文学学院院长纪秋郎教授毫不迟疑地指出：“在我个人所阅读的范围中，愈发觉得《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在西方的文论中，能够拿来和《文心雕龙》做比较的几乎没有，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也没有这样周全的考虑，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可以放在世界文论的金字塔顶。”^①遗憾的是，西方学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和承认《文心雕龙》这种巨大的理论价值。不少学者甚至对《文心雕龙》及中国古代文论一无所知。偏见往往产生于无知，或者说产生于对客观事实的不关心。西方学者对东方文论的轻视甚至蔑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东方文论的不了解。美国学者海陶韦（James R. Hightower）曾坦率地指出：“我们对欧洲文学理论的发展经过所知颇详，对印度文学理论的发展也略知梗概，可是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就几乎一无所知。”^②然而，这种“几乎一无所知”的状况，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根本性的改观。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跨越东西方文化圈、融全世界文学理论为一体的文学批评史呢？

海陶韦教授的这种反省，我们不但应当赞赏，而且应当仿效。作为东方国家的学者，我们对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国的文论又知道多少呢？我们在批评威斯坦因等西方学者之时，的确应当扪心自问。长期以来，东方国家的文学理论，

① 《文心雕龙综论》，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77页。

② 见《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64页。

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东方国家的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文论著作，长期不为学界所知。有感于这种不正常状态，我于十多年前编了全国第一部《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季羨林先生为此书作序指出：“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同自产业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科技方面进步一样，主宰着当今世界上的文艺理论的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崇洋媚西的气氛。最可哀的是，有人连这种感觉都没有了。”学界对东方文论几乎无知，“知西而不知东。知西知到什么程度，虽然还可能有些疑问；但不知东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这种无知，正是‘贾桂思想’的根源”^①。可以想见，对东方文论基本无知，怎么能够产生融东西方文论为一体的总体文论史呢！

以上两例，足以说明“西方中心”的观念在文学研究中的强大势力。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海内外没有识才慧眼，没有客观、公正而又高瞻远瞩的学者。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Rene Etiemble）就是一个杰出典范。作为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艾金伯勒恰恰一反前辈的狭隘观念，力倡扩大眼界，融东西方文学研究为一体，号召学习汉语、孟加拉语和阿拉伯语，对世界文学进行全球范围的研究，从中“去尝试概括出一个由诸不变因素（不变量）构成的系统”，将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结合起来，以建立一门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学会第 11 届年

^① 《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 页。

会上（1985年，巴黎），艾金伯勒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为题作大会发言，盛赞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并赞同中国同行们的实践及观点道：“我十分赞同远浩一的意见，他批判了那些把自己禁锢在自命的所谓西方文学中的比较文学家们，他们的行为使人们在使用形容词‘总体的’时全然谬误了。”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要考虑一下当人们不了解阿拉伯文学的全部，不了解印尼、中国、日本、印度、黑非洲各国等等文学的全部时，他们是否有权使用比较文学的头衔”。在这篇热情洋溢而又尖锐深刻的发言的结束语中，艾金伯勒诚恳地指出：“法国在一段时期内曾在我们这个学科内居领先地位，曾几何时，它发现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已结束的’世界里了，（这里取瓦莱里对形容词‘已结束的’所下的定义）倘若我们的比较文学界不满怀诚意，竭尽全力地效法中国的榜样，我们就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取‘死亡’意思的世界。”^① 不过有艾金伯勒这样高瞻远瞩的学者，我们相信法国比较文学不但不会“结束”，而且必将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当然，不仅比较文学的发祥地——法国有慧眼，当今比较文学的重镇美国，也有不少远见卓识的学者。前面提到的韦勒克，确是一个目光远大的学者，他极力反对狭隘的文化扩张主义，主张将全世界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语言上的区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主张“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研究整个西方传统——在我看来总是包括斯拉夫传统——同最终比较研究

① 引自《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89年第1期。

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韦勒克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号召人们通过全世界文学比较研究去探寻文学的奥秘和规律，而不是为比较而比较，更不是为了维护所谓比较文学的“纯洁性”而去设置种种人为的限制。他认为，只要人们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把握住艺术与诗的本质，把握住艺术与诗超越人的生命和命运，并塑造了一个想象的新世界这一特点，那么民族虚荣心就会烟消云散”^①。在美国，这样的学者还有不少，他们都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东西方文学及其理论交流、互补乃至融合的可能性及其巨大意义。克劳迪奥·纪延(Claudio Guillen)指出：“我认为，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包括英国)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时，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②海陶韦主张西方学者应当研究中国文学及其理论，因为“这方面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替文学找到定义，而这定义当然比以前一小部分人的文学经验更令人满意”^③。至于中国同胞，对中国文论的价值更有着充分的认识。尤其是一些外籍华裔学者，正在努力宣传中国文论的理论价值，并尝试着将东西方文学理论加以比较研究，从而探寻世界文学规律，以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其突出的代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学者刘若愚教授。他在所著《中国的

① 见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165页。

② 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1期。并参见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7页。二者文字表述稍有不同。

③ 《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64页。

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他写这本书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源远流长，而且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他传统的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可以说，这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是不能没有东方文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刘若愚教授说：“我希望西方的比较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注意到本书提出的中国文学理论，而不再仅仅以西方的文学经验为基础去建构一般文学理论（General Literary Theory）。”^① 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执教的叶维廉教授，也对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叶维廉教授倡导中西诗学比较的旨意，在于打破西方文化“模子”的垄断，寻求世界文学发展的“异”、“同”，最终达到对文学规律、文学本质的寻求。他指出：“我们在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中，要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首要的，就是就每一个批评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方西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对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据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② 同样，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了东西方文学理论比较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学界泰斗钱锺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即所谓比较诗学

①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② 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16页。

(Comparative Poetics) 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①。

由以上著名学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东方与西方、海内与海外仍然存在着“西方中心论”的强大势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中心”的观念将万古常青,上述远见卓识之士,已经预见了“西方中心”观念的日暮途穷,已经指出了东西方文学及其理论必然走向交流、交融,必然走向“世界性文学理论”(或曰“一般文学理论”)的趋势;无论是法国的巨擘艾金伯勒,或是美国的泰斗韦勒克;无论是海外声名卓著的刘若愚教授,或是大陆德高望重的季羨林先生,他们的看法的基本立足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寻求人类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从“异”与“同”的对比之中去发现文学及文学理论的“不变量”(艾金伯勒语)、“文学性”(韦勒克语)、“共同诗心”(叶维廉语),去把握“艺术与诗的本质”。这就是比较文学——甚至可以说是一切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离开了这一点,一切文学研究都很可能误入歧途(前车之鉴已有不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势必具有极为宽阔的胸怀、极为开阔的视野,就必须从全人类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精华,从全世界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的观点之中披沙拣金。在这里,任何民族偏见都是有害的,“西方中心”抑或“东方中心”的观念,都将是我们的前进中的绊脚石。只有丢掉“为自己

^① 参见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

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摘掉“不准入内”的牌子，摆脱那些文化扩张主义的偏见和种种人为的限制，才有可能产生韦勒克所呼唤的超越东西方民族界线的文学史和文论史。

本书名为《中外文论史》，而非《世界文论史》或《总体文论史》，是有我自己的学术考虑和学术目标的。我的基本目标大约有以下数点：

第一，长期以来，学界对全世界古代文论史的本来面目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正因为不清楚，一些偏见才得以大行其道，才会出现威斯坦因那种（即认为东方没有文体分类，详前文）信口雌黄之论；事实胜于雄辩，本书的首要目标是还全世界古代文论史（19世纪以前）的本来面目，力求以客观的文论史实和翔实的文献资料来描述和证实中外文论或曰东西方文论各历史阶段的历史地位、基本特征及其理论价值。

第二，本书力图从总体文学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一个全面的中外文学理论发展概貌，让读者全面地认识各国文学理论的不同特征以及对世界文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并进一步认识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的基本规律，为建立所谓“总体文学理论”（General Literary Theory，或曰“一般的文学理论”）提供若干有益的借鉴。

第三，文学发展，既是纵向的，又是横向的；纵向发展是各民族文学内部的继承性发展，横向发展是世界各民族互相之间的影响、冲突和交汇。这一纵一横的经线与纬线，织成了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论。可以说，纵向的“通变”与横向的互相交流与影响，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

然而，现在的文学理论著作，绝大多数只谈纵向的历史发展，缺乏横向交流和影响关系的论述，形成了孤立的、缺乏参照和比较的文论史，不能在整个世界文论发展潮流之中，让人在比较和参照之下来深刻认识全世界文论的价值和特色。因此，本书不拟像一般文论史那样，让读者了解中外各时代的文论概貌、批评家及其论著便万事大吉，而是力图将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结合起来，通过客观的概述、特点的比较及理论规律的总结这样三个部分的有机结合，来描述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概貌，揭示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的独特色彩及其理论贡献。这种编排，是在论述各国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用横向比较的纬线，将各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经线穿插交织起来，以便让读者从纵横两个不同角度，更好地认识全世界文学理论这张大“网”，客观而全面地了解全世界文学理论发展概貌，并在比较之中更鲜明地认识各国文学理论的不同特征以及对世界文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力图改变那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东西方文论天各一方，由于互相不了解而导致的互相不理解的状况，以客观史实来促进中外文论界的互相了解与理解。

第四，这部《中外文论史》特别注重文化探源性的跨异质文化比较研究，这是我在比较文学方法论上的又一着力方面。

一般而言，文论史大多论述“是什么”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文论史，只要将“是什么”说清楚，把各家文论思想观点交待明白，也就达到目的了。但作为跨异质文化研究的《中外文论史》，如果仅仅论述“是什么”，总让人觉得不惬